

《周礼》的自然生态观



研究《周礼》以天地四时分制设官的仿生态思维，系统阐发《周礼》的自然生态思想观念。

周延良 翟双萍 ● 著

《自然国学》丛书

第四辑

 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金瓶梅詞話卷之四



金瓶梅詞話卷之四

金瓶梅詞話卷之四

金瓶梅詞話卷之四

《周礼》的自然
生态观



周延良 翟双萍 • 著

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周礼》的自然生态观 / 周延良, 翟双萍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5. 7
(自然国学丛书)
ISBN 978-7-5507-1397-0

I. ①周… II. ①周… ②翟… III. ①《周礼》—生态伦理学—研究 IV. ①K224. 06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0101号

《周礼》的自然生态观

Zhou Li de Zi Ran Sheng Tai Guan

出品人 聂雄前
出版策划 尹昌龙
丛书主编 孙关龙 宋正海 刘长林
责任编辑 秦海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风生水起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93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同舟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Tel: 0755-83618288
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0.5
字 数 132千
定 价 30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总序

21世纪初，国内外出现了新一轮传统文化热。人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。世界各国也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联合国设立孔子奖，各国雨后春笋般地设立孔子学院或大学中文系。显然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，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，是中华民族振兴、腾飞的基础。面对近几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文化热，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，并从新的高度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。我们这套《自然国学》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

自然国学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研究”中提出的新研究方向。在我们组织的、坚持20余年约1000次的“天地生人学术讲座”中，有大量涉及这一课题的报告和讨论。自然国学是指国学中的科学技术及其自然观、科学观、技术观，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系统研究，以致社会上不知道国学中有自然国学这一回事；不少学者甚至提出“中国古代没有科学”的论断，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创新精神。然而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：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，而且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，至少有甲骨文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；在公元3世纪至15世纪，中国科学技术则是独步世界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；中国古人富有创新精神，据统计，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500年的2000多年中，中国的技术、工



艺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%；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文献数量，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。因此，自然国学研究应是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。对它的深入研究，不仅能从新的角度、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，而且能从新的角度、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，有助于当前的科技创新，有助于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之路。

本套丛书是中国第一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。其任务是：开辟自然国学研究方向；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；以全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，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列新的思维、新的“基因”。它是“一套普及型的学术研究专著”，要求“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，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”。这套丛书的特点：一是“新”，即“观念新、角度新、内容新”，要求每本书有所创新，能成一家之言；二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，既强调每本书“是各位专家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”，学术上要富有个性，又强调语言上要简明、生动，使普通读者爱读；三是“科技味”与“文化味”相结合，强调“紧紧围绕中国传统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相融”这个纲要进行写作，要求科技器物类选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，观念理论类选题注重从中国传统科技的角度进行解释。

由于是第一套《自然国学》丛书，加上我们学识不够，本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，乃至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。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听到批评、指教之声，形成争鸣、研讨之风。

《自然国学》丛书主编

2011年10月

前 言

《周礼》是儒家经典中的一部重要文献，拙著以《〈周礼〉的自然生态观》为题，是建立在对《周礼》的两个方面的认识：

一是《周礼》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观念并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管理中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“社会生态”和“人文生态”理论——《周礼》“六官制”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。“六官制”虽未见于后世的全面继承^①，但“六官制”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巨大影响，尤其是它的“自然生态”思想，不容忽视。拙著的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大抵是这一领域的专论。

二是《周礼》记载对“自然生态”的管理，可以认为是在“自然生态伦理”基础上建立的关于“社会生态”“人文生态”最系统的理论，也是今天可以看到的最集中、最专业的文献记载。在《周礼》“自然生态”管理思想方面，我们注意到，《周礼》时代的华夏人类，不仅认识到要合理利用生态资源，而且认识到合理利用“自然生态”资源是为了自然资源的再生——这种管理思想，笔者称之为“优化自然生态思想”。拙著中的第四章和第五章，做了专门的考察、讨论。

生态被破坏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。建设当代生态文明，固然需要先进的科技手段，但比先进的科技手段更为重要的是“生态文明”的思想观念。没有人类的“生态文明”思想观念，单靠

^①详论见“绪论”引郑樵之说。

先进的科技手段解决不了生态被破坏的难题！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，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的经验和方法是必要的，但是《周礼》中的生态思想更适合国情，其思想精髓，不比发达国家的生态理论落后！

对古代的生态思想研究，虽然已经有学者关注，我们也看到一些刊布的文章，但是系统的研究尚待来日。希望拙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拙著由周延良与翟双萍共同完成，第一章至第三章由周延良完成，第四章至第六章由翟双萍完成，周延良最后统稿。

绪 论

儒家的经典文献，以“五经”（也有“六经”之说）为总。“五经”实为七部书，因为其中的《礼经》是由三部书组成，《周礼》是“三礼”中的一部。从周到汉代初年，“五经”的传承（相对而言，《易经》可以例外）疑点或未知的问题甚多，《周礼》自然不能除其疑。历史上甚至有以《周礼》为伪书者。

拙著以研究《周礼》自然生态思想为题，其书真伪是无法回避的问题；同样，《周礼》中的自然生态思想虽偶有涉及真伪问题，但未曾专题详为考察，故藉此篇端，略陈浅见，亦祈方家正焉。

一、《周礼》的真伪

《周礼》，史称《周官》，刘歆佐王莽之际，始作《周礼》^①。

《周官》或《周礼》作为儒家的经典文献，同样是一部在历史上就存有极大争议的书。晚清，廖平、康有为等人竟附会并张扬南宋洪迈认为此书为刘歆伪造^②的荒诞不经之论，影响所及，至20世纪80年代。

①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周官经》六篇”，班固自注：“王莽时，刘歆置博士。”唐颜师古曰：“即今之《周官礼》也，亡其《冬官》，以《考工记》充之。”（卷三十）

②南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·续笔·〈周礼〉非周公书》曰：“《周礼》一书，世谓周公所作，而非也。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，考其实，盖出于刘歆之手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尽载诸经，专门师授，此独无传。至王莽时，歆为国师，始建立《周官经》以为《周礼》，且置博士，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，还家以教门徒。好学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，此书遂行。”（据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卷十六）

此说纯属无稽之谈，可以不论。

《周礼》真伪，东汉以后颇多拟议，确《周礼》为真者，盖东汉郑玄；斥《周礼》为伪者，汉、晋林孝存、何休辈^①。宋代以后，聚讼之说，不可胜记。清代初年，落第文人姚际恒撰《古今伪书考》中涉《周礼》，但文已佚^②。

拙著以《〈周礼〉的自然生态观》命题，自然有不避真伪之嫌，以出土文献可证，《周礼》真伪，似不必辨。然此乃学术史，故当就近现代所论诸家之要者述之。

晚清皮锡瑞撰《五经通论》《经学历史》，于《周礼》真伪皆有说，兹就皮锡瑞先生《经学通论》论《周礼》真伪之目述如次：

《论〈三礼〉皆周时之礼，不必聚讼，当观其通》《论〈周官〉改称〈周礼〉始于刘歆，武帝尽罢诸儒，即不信〈周官〉之证》《论〈周官〉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，非必出于周公，亦非刘歆伪作》^③。

皮氏所论概括为三点：（一）《周礼》中“礼”是周代礼法；（二）汉武帝时已见《周礼》，但武帝不用《周礼》；（三）《周礼》是战国时人编订。

皮锡瑞是经今文学家，而《周礼》无今文，足见皮氏之说为平实。

民国张心澂撰《伪书通考》，涉猎文献，可谓详博。张心澂先生总六则，以《周礼》为伪书。张氏之说六则如次：

（一）来历不明；（二）先佚而后详；（三）初出及推行时有反对；（四）所言制度与周初不合；（五）所言与他书不合；（六）三次试验无效。

列此六则之后又说：“综以上六证，则《周官》非周公之作，可断

①参见《周礼注疏》唐贾公彦《序〈周礼〉废兴》。

②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订《姚际恒著作集》第五册（林庆彰主编，1994年版）。

③据《经学通论·三礼》（中华书局，195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本，第46~49页）。按，原无书名号与其他标点符号，因属篇题，故此。

言矣。”^①此为反证，又出七则为推测之证，曰“《周官》既非周公之作，为何时何人之作乎？兹推究之如下”云云：

（一）汉武帝以前之作品；（二）战国时之作品；（三）战国时策士之计划；（四）儒家兼法家、理财家之计划；（五）采西周及春秋时期制度参以己意而成；（六）战国前期之作品；（七）刘歆之改窜公布。

嘱此七论，则结语曰：“综上所述，则《周礼》一书，为战国前期儒家而通法理经济者所草拟之《建国方略》。至西汉前期发现而入秘府。及王莽时，刘歆见之，改窜而公布。”^②

观两家要目可知，皮锡瑞与张心澂所论之不合者，在于《周礼》是否为周代礼法。皮氏主张《周礼》所记皆可视为周代礼法。

张心澂所谓“来历不明”云云，在“五经”中，亦非《周礼》一书，除《周易》外，其他“四经”俱存“来历不明”之争，“四经”亦可乎？

张氏所谓“三次试验无效”者：汉王莽一试，北周宇文周再试，宋王安石三试，以三用《周礼》而失败证《周礼》之制无效，其说非也。朝代更始，废旧立新，原本常事，如同民国不用清代之制，清代之制岂能为伪？用之而不效，亦可谓之“伪”？近人蒋伯潜先生撰《十三经概论》，专论驳“三次试验无效”者，其意甚详，所言“迄于明、清，六部尚书，其官制固尚存《周礼》之大体^③”。极是，窃可不费词。

钱穆先生就《周礼》的真伪问题，曾做考证。钱氏认为《周官》属晚出之书，刘歆议立诸经之际，《周官》不在其中。后王莽据《周官》立政，并非刘歆据王莽之意伪造《周官》。《周官》的内容如井

①《伪书通考·经部·礼类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8年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影印，第313~314页）。

②同上，见316~326页。

③参见《十三经概论·〈周礼〉概论》第一章《〈周礼〉解题·〈周礼〉为战国时人书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255~257页）。

田、分州、爵位等早见前朝典籍记载，刘歆不必另造一书疑天下学人。钱穆著《〈周官〉著作时代考》一文^①，论《周官》一书既非周公所作，也非刘歆所能作伪，以《周官》成于战国晚期为结论。

钱氏之论《周礼》成书时限，大抵不出皮锡瑞之囿。至于顾颉刚等所谓“古史辨派”说，可以不予置辩。

《周礼》非必周公亲为，或曰非周公亲作，未尝不可。但其中所载礼法，西周初年已经形成，可以从考古出土文物或文化遗址得以证明。尤其《周礼》所记名物，是当今商、周考古判断器物名称、功用、文化内涵等问题的重要参证。

“三礼”之书，《礼记》最为晚出。1993年，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楚墓，其中一号战国楚墓七百多支有文字竹简中，考古学界最为首肯者《缁衣》。《缁衣》是《礼记》中一篇，可证《周礼》至少在战国之前已经成书。那么，成书于战国之说者，其说亦不攻自破。

依笔者之见，“郭店楚简”中《太一生水》之文，当在《缁衣》之前。《太一生水》尽述“五行终始”之理，“五行终始”之理是《周礼》的理论支柱。

出土文献，解决了两千年的争执（含东汉林孝存与郑玄之争），《周礼》不伪，出土文献，证为定谳。

又，《孔子家语》一书中记载着孔子的言论，是书于西晋由王肃献出（王肃为之作注）。宋代以后，多以为王肃造伪，定为“伪书”。但随着考古的发展，不断出土文物（竹简）证明，此书不伪。上世纪70年代，安徽阜阳出土的汉代竹简有与《孔子家语》相近的简文。1973年，河北定县八角廊发掘西汉墓，其中有出土的竹简定名为《儒家者言》，内容与今本《孔子家语》相近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

①见《燕京学报》1932年第11期。

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，唐颜师古注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^①颜师古说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者，盖别于王肃作注之《家语》，并无他指。王肃不会在尚未出生之前的数百年先造出一部《孔子家语》，待出生后献给君王吧？

《孔子家语》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孔子尊崇周公，尤推尚西周文化。《论语·八佾》载孔子之语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宋邢昺疏曰：“此章言周之礼文尤备也，‘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’者，监，视也。二代，谓夏、商。郁郁，文章貌，言以今周代之礼法，文章回视夏、商二代，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，‘吾从周’者，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，故从而行之也。”^②邢昺疏文所说，可谓确论，言“周之礼文尤备”“周之文章备于二代”，所指向者皆为《周礼》。《周礼》为孔子推尚，亦为孔子所见，孔子倘无所见，何发此感叹？孔子宁无如后之“疑古”之徒？况《孔子家语》中，每有与《周礼》相合之义，劳者自视，此不备述。

康有为说《周礼》为刘歆伪造，源于南宋洪迈。此说之缪，本不足辨，且前人早有讥驳，今所及之，盖因康有为之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多剽袭其友廖平《今古学考》，评其学品，至为不伦！又，以洪迈之学养，本不当出此谬说，然以宋代（以南宋为最力者）疑古，以“疑”为尚故也，余波所及，达于20世纪80年代。

“疑古辨伪”，荐献之劳，或可嘉许，然否定民族文化遗产，危害学术之深远，不可以数量计！实在说也造就了很多的笑话，明哲不可不查。

清朱彝尊《经义考·周礼》引郑樵曰：

《周礼》一书，或谓文王治岐之制，或谓成周理财之书，或谓战国阴谋之书，或谓汉儒附会之说，或谓末世渎乱

①据《二十五史》本《汉书》卷三十。

②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论语注疏》卷三（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印本，第2467页）。

不验之书。纷纭之说，无所折衷。予谓，非圣人之智，不及此。五等之爵，九畿之服，九州十二壤，闽、蛮、夷、貉，祭天祀地，朝觐会同之事，皆非文王时政所得及也。以是书而加文王，非爱文王者也。虽其书固详于理财，然其规画也似巧，而惠下也甚厚；其经入也若丰，而奉上也甚约；谓为理财之书，又非深知《周礼》者也。使战国有如是之法，则战国为三代矣；使汉儒有如是之学，岂仅为汉儒乎？惟见其所传不一，故武帝视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，而不知好也。至后世孙处^①又独为之说曰：“《周礼》之作，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，归丰而实未尝行也。”盖周公之为《周礼》亦犹唐之显庆《开元礼》也，唐人预为之，以待他日之用，其实未尝行也。惟其未经行，故仅述大略，俟其临事而损益之。故建都之制，不与《召诰》《洛诰》合；封国之制，不与《武成》《孟子》合；设官之制，不与《周官》合；九畿之制，不与《禹贡》合。凡此，皆预为之，未经行也。是书之作于周公，与他经不类。《礼记》就于汉儒，则《王制》所说朝聘，为文襄时事；《月令》所说官名，为战国间事。曾未若《周礼》之纯乎周典也！惜乎，自成帝时，虽著之《七略》，终汉迄唐，寥寥千百载间，竟不置学官博士。文中子居家，未尝废《周礼》，太宗读《周礼》，谓“真圣作”，其深知《周礼》者欤！若夫后世用《周礼》，王莽败于前，荆公败于后，此非《周礼》不可行，而不善用《周礼》者之过也！^②

①孙处，字季高，（南朝·宋）会稽永兴人。事迹俱载《宋书》本传。

②据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卷一百二十。按，朱彝尊此引，盖出郑樵《六经奥论·周礼经·周礼辨》卷六，文字颇有增损。按，有引作《通志》者，非也。

郑樵是南宋初年“疑古”（“疑经”）的代表人物，但此论中却以《周礼》为可信书，所论亦平实客观，是很有说服力的见解。就《周礼》的成书，郑氏总为五家之说，在宋代是谓之为全。就《周礼》之制与前世、后世实施的历史状况做了辩证的论说，不待后人费词，其事实已甚明了。

《周礼》“六官制”前人论之极翔实，于此略之。以下，就拙著考察“《周礼》自然生态观”等问题，稍作交待。

二、《周礼》自然生态观

“生态”，可以界定为人类的生存环境，中外学术界把人类的生存环境分得很具体，除了“自然生态”以外，还有“政治生态”“社会生态”“文化生态”或“人文生态”等等。

《周礼》中不仅贯穿着“自然生态思想”，同样也有“政治生态思想”“社会生态思想”和“人文生态思想”。近几年，随着“国学热”的增温，研究儒家“生态思想”的成果也有刊布，但系统研究的并不多。

《周礼》之制是否实施于社会，《周礼》中的“自然生态”制度是否实施于社会，不是拙著准备考察的问题。拙著要考察的是《周礼》“自然生态思想”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《周礼》“自然生态思想”的形成，也是“周监于二代”的结果——是西周初年综合取舍了夏、商、周原始文化完成的。《周礼》“自然生态思想”最深刻的文化背景是“原始宗教伦理”，而尊崇物质世界又是“原始宗教伦理”的核心^①。“自然生态思想”就是从尊崇、膜拜物类甚至图腾延伸出来的——它是感情的，而不是感性的；它是理智的，而不是荒诞的。

^①这里不作详论，可参看周延良的《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论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07年版）。

《周礼》分职“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六官之制，恰好说明了这一史实。

拙著将考察：

一、《周礼》“天地官”分制的自然生态观。

“天官”“地官”分制的建立是在参照史前文化基础上完成的，是史前文化积淀的氤氲化生。“天地”之官与“天地”两者之间存在着早期华夏人类认知中的深刻联系。“天地”是一个古老的概念，早期华夏人类对它的理解和认识观念，至少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就完全形成了。从到目前为止出土和发掘的文物、文化遗址中，基本可以确定，《易》学形成之后，“天地”观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认识体系，是早期华夏人类自然观念的支柱。《周礼》设“天地”之官，是这一理论的延伸和扩展，也是《周礼》“天官、地官”设官的理论背景和理论依据，比之《易》学中的“天地”观，它们是理论主体与分支体的关系。“自然生态思想”是形成“天地”官设的核心。

二、《周礼》“四季”设官分制的自然生态观。

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概念见于《周礼》（或《周官》）而分别官制设立的依据是什么？历史上基于东汉郑玄的解说之后做了一定的发挥，无论怎样发挥，都不出郑玄解说本义的范围，为今天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留下了虽然简单但很重要的文献。“天地”作为广义的生存物质形态本身而成为人类生存中的认识视阈，是从人类完成了认识物质世界的智能进化开始的。至少在原始社会早期（旧石器时代），华夏人类已经具备能动地创造物质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的智慧。此时，华夏人类文化心理深层虽积淀着原始的“物我混同”观念，但与物类的长期接触和生存中的物类利用，已经形成了与物质世界中物类对象化关系的认识。“天地”作为物质形态认识对象的认知也形成了——这是人类具备创造文化和不断地创造文化的思维功能的标志（特别是人类区别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类本质条件），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类属的“类本质”。创造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也可以称为在原有文化的基

础上创造新的文化，认识自然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所必需的，不断地“自然人化”是“人”类本质最重要的标志。

三、《周礼》中的“土圭”与自然生态观。

地球的自然空间方位和节令（气象），就今天而言是基本的生活知识，但在人类确定方位、节令之始，实在是人类文化创造中的伟大认知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方位、节令（气象）认知的重要意义愈加凸显。中国人特别重视对方位、节令（气象）的认知，诸如建筑物、街巷、旷野、道路等等——在很多方面都以认知方位、节令（气象）为首要参照条件，尤其古代就更为明显。在世界古老的民族中，中国人是最早认知方位、节令（气象）的文化共同体。根据现在可见的文献记载，《尚书·尧典》中已经有判定方位节令（气象）的认知。《尧典》虽为后人“疑古”质疑，但质疑判定方位、节令（气象）的记载是没有理由的。《尧典》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记载是明确的，如“宅嵎夷曰暘谷”“宅南交”“宅西曰昧谷”“宅朔方曰幽都”（引见《尚书·虞书·尧典》，据《尚书注疏》本卷一）——这是就东一春、南一夏、西一秋、北一冬四个方位、节令做了很具体记载的文献。测知方位的工具是什么？是土圭——大约在尧、舜时代，土圭就是测知方位的工具。

四、《周礼》中辨土别物与优化自然生态观。

“辨土别物”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，除了自身机体的生理进化，最重要的是智能进化。“辨土别物”是人类智能进化到建立或组成社会结构的思维产物。制造劳动工具应该是“辨土别物”智能的起点，这种智能也是人类早期阶段就形成了的。形成早期人类“辨土别物”思维功能的前提条件是长期认知自然生态，因此，“辨土别物”本身反映的是人类的“自然生态观念”。“辨土别物”作为古人的自然生态观念，《周礼》中有着广泛的记载，是上古时期“辨土别物”很成熟的社会行为，具有承上启下的坚实的文化惯性，是“三代”文化延伸的重要范畴，也是影响后世